

身体、情感与空间再造: 城市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具身体验

——基于6个城市社区的田野考察

李晓栋^{1,2}

(1. 中北大学 体育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51; 2.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0)

【摘要】: 运用文献研究、半结构访谈和逻辑分析的方法, 从身体、情感和空间等3个维度分析了城市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具身体验, 旨在从多元化的角度提升居民的社区体育参与质量。研究指出: 身体、情感与社会这3个层面的体验感共同构建了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机制。就身体层面而言, 居民不仅仅希望通过有效的体育参与来改造自己的生理身体健康水平, 同时也希望能够改善自己的社会身体; 就情感层面而言, 个人在社区体育参与中的价值回报与他人认可让参与行为有了内在驱动力, 同时组织认同感的提升也让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有了重要他者的陪伴, 让参与行为有了群体认同的驱使, 同时对于运动刺激的追求也满足了参与者的个人情感需求; 就空间层面而言, 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改善让实体性空间条件得到了强化, 参与集体性的社区体育活动也让组织空间得到了扩大。

【关键词】: 身体健康; 情感体验; 空间再造; 具身体验; 城市居民; 社区体育

【中图分类号】: G81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3)04-0087-12

DOI: 10.15877/j.cnki.nsic.20230904.001

社区体育是城市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重要途径, 是全面推动全民健身工程的核心举措, 目前我国社区体育开展的核心点已经不再局限于场地设施层面, 而是需要在组织管理、人员配置、赛事运作、指导服务等多方面实现综合提升, 进而鼓励更多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活动^[1]。随着全民健身工程的不断推行以及“大健康”时代的到来, 社区体育将成为居民参与体育锻炼, 进行自我健康提升的重要途径。健康虽然是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核心目的, 但并非唯一目的, 社交需要、生活品质提升、认同强化等都可能成为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目的。居民社区体育参与需求多元化发展意味着参与机制也会随之而变化, 需要从更为丰富的维度和视角来审视居民社区体育参与问题。这对于提升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质量, 实现社区体育供需平衡具有积极的意义。就居民参与社区体育这一现象而言, 内在驱动力和外部环境是体育参与行为产生的因素, 从具身理论的视角出发, 内外部因素产生影响的前提是居民在参与社区体育过程中的真实体验, 因此明确居民社区体育参与的机制问题就需要将这种真实体验进行细致深入

的分析, 进而实现对居民社区体育参与行为发生机制的有效诠释。

1 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1.1 文献回顾: 从参与现状到参与机制的动态演变

早期学者们就我国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现状进行分析, 其中, 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滞后是影响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一个关键性要素^[2], 经费问题^[3]、组织建设问题^[4]、制度建设问题^[5]、场地问题^[6]等也是困扰我国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因素, 多重因素导致了我国居民在社区体育参与方面存在频次不够、内容不全面、管理不完善等^[7]。由此, 学者们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和策略, 以有效促进社区居民更好地参与体育运动。

随着全民健身工程的不断推进以及我国基层社区体育治理体系创新要求的不断提升, 关于城市居

收稿日期: 2023-07-17

基金项目: 2022年度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22YY108); 2020年度山西省体育局科研项目(20TY113)。

作者简介: 李晓栋(1989—), 男, 山西长治人, 博士, 副教授, 在站博士后, 研究方向: 社区体育治理。

民参与社区体育的研究专项针对参与机制问题进行探讨,核心在于激发居民在社区体育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研究可以归纳为3种不同的视角:第一,政治学视角。认为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居民自治是属于政府主导型的自治^[8],社区民生问题就是一项政治问题,政府对社区治理建设的重视程度很高,但是政绩工程的影响也非常显著^[9]。第二,社会学视角。该视角认为地缘关系形成了居民之间的群体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使其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同时居民之间通过人际交往构建起了稳定的信任关系,对于居民参与社区事务产生积极影响^[10]。第三,经济学视角。该视角认为人是理性的“经济人”,其参与社区治理的原因在于能够获得有效的经济利益。就上述三种视角而言,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原因可以看作是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的驱动,目前仍然没有一个理论视角能够同时破解宏观和微观所带来的局限,从而真正破解社区体育治理居民“参与难”的问题。

学者对于居民参与社区体育问题的探讨和分析是不断完善和深入的,研究的视角也契合于我国各阶段社区体育开展的基本情况。但是无论是从现状还是机制的角度,现有研究视角下的社区体育更像是一种“宏观背景”,更多聚焦于居民自身的参与质量或者更为广阔的基层体育开展问题上,目前学者们将“居民参与社区体育”作为现象本身所进行的研究是相对较为欠缺的。长期以来,在功能主义理论视角的影响下,闲暇时间+经费+健康需求就构成了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全部驱动性要素,但是是否所有的居民都是基于上述要求和条件进行的体育参与?不同群体在参与社区体育过程中是否也是基于同一种诉求?这些问题尚没有学者进行针对性解答。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建设中,如何让广大居民更好地参与到社区体育中是社会体育发展的时代诉求,但是多元化的参与必然意味着多元化的参与体验,只有厘清居民在社区体育中的参与体验才能够“对症下药”解决社区体育开展中的各项问题,这也是本研究力图解决的一个核心议题。

1.2 研究框架

就西方学者的研究来看,居民在社区公共活动中的参与体验是解释社区公共服务运作的一个关键

点,居民在社区参与中的表现、感知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自身的行为表现。随着西方社会学关于身心一体化的思维转向,具身理论成为解决个体行为问题的一个重要指导理论。在具身理论看来,“身体既非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化身体,同时也并不是一种主观的意识体验”^[11]。对于个体行为的研究,身体、心理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新的解释框架,身体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思维反射器,而是一种具有能动性的思维主体,个体行为的产生能够不断地积累个人经验,这种个人经验正是行为对外在环境的一种有效反馈^[12],为解释居民如何参与社区体育活动提供了有力的解释框架。

目前,关于具身理论的研究框架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在西方哲学的视角中,身体是个体处理信息的载体,身体与心理之间并非完全契合的,身体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并没有被真正的加以重视;其次,在传统的具身理论看来,虽然身、心是一体的,但是身体和心理并没有一同成为个体认知和行为的基础性条件,没有足够的“经验”来诱导行为的产生;最后,在西方哲学和心理学范畴中,具身性分析并没有完全将“情景”的概念纳入研究范畴之中,因此很多具身体验的研究中为了简化研究将个体的外部环境看作是“情景”^[20]。因此从具身理论的总体框架而言,对于个体行为的分析主要是从身体、心理和环境等3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具身理论出发,分析个体行为的3个要素就是身体、心理和环境,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共同产生了社区体育的参与行为。在3个分析维度上,身体维度同体育参与行为较为契合,身体也是体育运动分析的核心维度,因此予以保留。但是在心理维度和环境维度方面,为了同体育参与行为相匹配,在表述上也进行了相应的转换。首先,就心理维度而言,其指向于个体在体育参与中的内心活动,是一种对社区体育参与的内心感知,虽然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心理”的范畴要大于“情感”的范畴,但是在解释居民个体行为的过程中,心理更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体育运动的直接内心感知,这种内心感知在普通人群中更可以看作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对于居民个体内心体验的解释更加直接。与此同时,“情感”可以反映身体在环境中体验的多重结果,而且在关于个体的研究中,“情感”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主观精神

问题,在体育参与中,身体是情感发生最为紧密的“空间尺度”,可以形成以自我感知为中心的“身体情感”,这就与身体的维度形成了逻辑关联,因此本研究用“情感”代替了“心理”。其次,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对于“情景”维度的分析经常会用更为综合稳定的“环境”来替代,但是在本研究中以“空间”代替了“情景”。在体育参与中,身体所处的外部环境并非仅仅局限于一种“物质环境”,而是同样包含一种“组织群体环境”,两种环境的结合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身体及与身体紧密联系的周遭空间,是一种处境性的空间,这种空间有效地概括了身体所处的位置以及背景的意义^[21]。因此在本研究中为了更好地解释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机制,将从身体、情感和空间等3个维度来进行分析。

第一,体育运动的本质特征是针对身体的一种改造性活动,因此身体因素将成为分析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首要因素。从身体社会学出发,身体可以看作是生理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这也是本研究在分析身体时所采用的两个维度。生理身体能够反映出居民在社区体育参与中的“机体变化”,是一种居民给予自我身体感官上的体验和理解;社会身体则是居民在社区体育参与中一种身体经验的表达,是一种对社区体育参与体验的自我感知。

第二,将情感作为分析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核心维度,是具有社会学和心理学依据的。在社区体育参与中,居民有着更为复杂的认同性情感,在这里情感并非一种单纯的主观精神,而是与群体——社会相联系的一种心理表达,居民的身体情感意味着其在社区体育参与中的自我价值实现以及与群体和外部环境之间的情感联系。

第三,从空间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其分为“身体的空间”和“在场的空间”两种理解思路,身体的空间就是身体与情感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一种身体所处的外部空间。而“在场的空间”则是指居民身体在社区体育参与中所具有的外部环境机制,或者说就是一种社区空间,是身体和情感在体育参与过程中所具有的位置性空间。从上述3个维度出发,本研究将尝试性地诠释居民社区体育参与的现象,聚焦于居民本身的具身体验,来分析其参与社区体育的整个过程和特征,解读这一看似平常却又值得深思的行为,最后形成一种具身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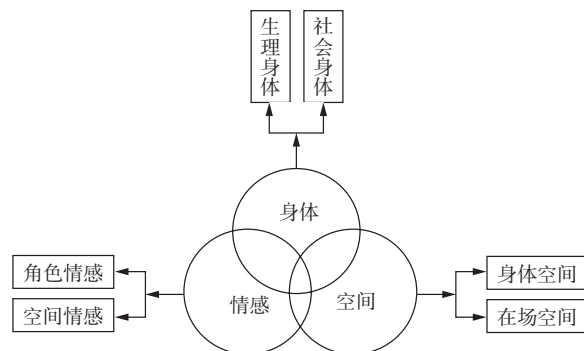


图1 居民参与社区体育具身体验的三维度交叉研究框架
Fig.1 Three-dimensional cross-sectional research framework of embodied experience of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sports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实证研究资料的收集方面主要采用了访谈法和实地观察法(参与式观察与非参与式观察),在实证材料分析方法上则采用了解释现象学分析法。

第一,样本区域的选择。本研究的核心议题在于分析城市社区居民的体育参与情况,因此选取了太原市的3个行政区:Y区、X区和J区。根据个案研究中判定个案是否具有典型性的标准和选取过程,最终选取了其中6个较为典型的社区(如有固定的社区体育自发性组织、有固定的社区体育参与人群、有相对问题的社区体育赛事及活动等)作为研究的样本社区。

第二,研究资料收集。笔者主要通过半结构访谈和实地观察两种方法来获取有效的研究材料,其中访谈主要是通过将研究所涉及的核心点转化为不同的访谈问题条目,让被访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阐述。而实地观察也采用了参与式观察和非参与式观察两种方式,旨在通过直观的视觉感受来获取真实的研究实证材料。

在半结构访谈中,笔者与3个区内2名街道办主任、8名社区文体活动负责人员、6名社区体育骨干以及20名社区体育参与居民进行了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访谈人数共计36人。每个访谈人员的访谈时间大于等于50 min,最终形成了6万字左右的访谈材料。

在实地观察方面,参与式观察主要是与6个社区的近200名体育爱好者一起参与了不同形式的文化活动,加入了1个社区足球队、2个社区武术队、4个社区广场舞队,共参与了大型体育展演或比赛4

场;非参与式观察则是笔者完全以外来者(观众)的身份观看了1次社区体育亲子运动会、旁听了1次社区体育多方协作联席会议,同时也观察了多次不同时间段的社区体育锻炼行为,如太极拳、广场舞、篮球等活动。

第三,资料分析方法。在访谈资料分析方法上运用了解释现象学分析法。这一分析方法的分析过程是一个两阶段的解释过程,即双重诠释(double hermeneutic)。解释现象学分析法就是在现象学分析的吸收了符号互动理论和个案研究的一些特点,核心目的就在于分析个体如何看待生活经验并赋予其意义,这是与本研究的主题相契合的。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所搜集的实证材料均为社区体育参与者个体的直接经验,且这些经验总是指向社区体育参与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社区体育参与的经验均为参与者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所不断构建的,这就满足了解释现象学方法所要求的还原性、意向性和主体间性的理论原则。在具体的研究步骤上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确定主题。即社区体育参与者在参与过程中的具身体验以及相应的参与机制。二是,选择样本。确定了上文中所提及的各个访谈对象。三是,获取资料。本研究中实证材料的获得主要是半结构访谈和实地观察,访谈结束后将录音的内容转录成文本。四是,资料分析。从访谈文字记录中识别出更贴合研究主体的短语,形成初级主题,随后采用主题突出分类方法对研究资料的初级主题进行分类,进而形成高级主题,之后以叙事分析的方法来呈现资料分析结果。

3 居民社区体育参与中“身体”的具身体验:生理身体与社会身体的舒适化改造

3.1 预防疾病与强身健体:生理身体的改造意愿

从功能主义理论出发,体育之于个体最大的功能就是身体的改造和完善,这种改造和完善是体育健身功能的直观体现,虽然体育无法完全代替药物和医学手段来治疗疾病,但是科学的体育运动能够促进身体健康已经得到了验证。为了更加清晰的说明这种关乎身体改造上的具身体验,笔者选取了病患群体这一社区体育锻炼中的重要人员群体来分析,这一群体在参与体育运动中更加期望能够实现一种生理身体的改造。

在社区体育参与者群体中,病患群体多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患者,疾病所带来的“身体异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个人认同危机。虽然就病患个人而言,疾病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剥夺生命,但是慢性病所具有的持久性以及对于身体的折磨严重影响了个体正常的生活秩序^[15]。但是作为经常性参与社区体育的慢性病病患群体而言,疾病的产生并没有使其丧失对于生活的信心,其迫切希望能够利用所有的生活资源和方法来改善自己的身体状况。从这一点出发,体育锻炼就成为社区内病患群体适应病患生活、应对健康问题时,实现个人认同的手段之一。

另外,社区体育为参与锻炼群体提供了积极有效的互动交流平台,也能够让病患个体的个人认同通过群体互助来实现重塑,即社区体育在实现居民生理身体改造意愿上具有双重价值和意义。单纯就身体角度而言,长期的体育锻炼确实让很多社区居民改善了自身的健康状况,对于一些慢性疾病的积极干预也得到了广大居民的印证。

“我31岁查出来的糖尿病,除了控制饮食还得每天坚持注射胰岛素,医生让我每天走路,我也害怕并发症的出现,因此每天我就围着小区走路,而且我自己也放下面子和大爷大妈们每天跳跳广场舞,坚持了一年现在已经告别胰岛素了。”(K先生,公务员,34岁,访谈提纲20220911)

从生理身体的角度是解释居民体育参与具身体验最为直观的思路,预防疾病、减肥塑形、增肌减脂、术后疾病恢复等,都是针对生理身体所进行的改造性活动,进而为其他身体实践活动创造基础。

除去单纯意义上的生理身体改造之外,以生理身体为基础所构建的自我认同同样在社区体育参与中实现了改造。从群体社会学的角度而言,病患群体属于拥有相同不良生活境遇或情绪体验的特殊群体,群体成员通过特定的集体活动能够实现相互之间的倾诉和交流,并能够不断为群体成员们提供信念支撑和价值指引,有助于病患群体重新塑造因为患病而失去的部分个人社会功能,从而为病患群体构建出一个相对稳定的个人认同意义系统。

“我很早就确诊的糖尿病,血压也比较高,很多东西都不能吃,原有的生活习惯被打乱,我也觉着自己是个病人,不能正常生活。但是近几年在医生的建

议下我开始坚持每天走路,而且我们几个糖尿病人经常一起锻炼娱乐,心情也好了。”(H先生,58岁,K小区业主,访谈提纲20220927)

病患群体的特殊性就在于群体成员都在生理身体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从事社区体育的一个核心目的就在于能够从生理学的角度来改造身体,实现健康目标。但是身体的缺陷也让个人对自我身体的认同产生了偏差感和自卑感,社区体育对于生理身体进行改造的同时,也改造着自我对于生理人体的认知,消除了对于个人身体的自卑感和偏差感,这也是对生理身体改造的具身体验。

3.2 积极乐观的身体活力:社会身体的改造意愿

居民在参与社区体育活动中不仅仅将体育锻炼或者体育参与看作是一种基于“身体改造”的目的性活动,而是更多的将其看作是休闲生活的重要建构内容。在调研的几个社区中,也有相当多的居民没有任何身体疾病,但是社区体育参与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体育参与更多指向了社会身体,而非生理身体。低强度的体育运动或体育游戏如踢毽子、飞盘、广场舞、健身操等,这些社区体育锻炼方式不需要专业指导和特殊的运动场地,内容构成也相对简单,趣味性较强,成为居民主要的参与方式和参与内容。

运动强度不大,且运动主体没有任何身体疾病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社区体育参与的情况,体现出一种明显的“节奏性特点”,这就并非单纯的生理身体所能够解释的现象,因此应该转向一种社会身体,即从身体的社会性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社会文化的不断变迁让人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社会身体健康不仅仅意味着没有疾病,而是能够通过身体彰显出个人魅力,甚至通过身体实现个人社会层次和社会地位的提升。通过有效的体育参与所获得的“身体感”已经不再是一种生理现象,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在运动中所获得的“身体体验”已经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开始对现代身体有了新的界定^[19]。因此作为社区居民而言,有效的社区体育参与不仅能够预防疾病,还能够强化居民的身体自信,进而改善自己的生活态度。

“我每天都会坚持跳广场舞,每天都会锻炼,甚至有时候家里有事耽误了时间也会自己在家跳一会,我本身身体没有毛病,但是有了毛病再跳就晚

了,每天跳一跳,我身材也好了,精神也足了,生活就应该是这样。”(J女士,51岁,H小区业主,访谈提纲20220902)

体育锻炼让居民对于身体的自信有了提升,在他人面前对于自我身体的肯定性有所强化,基于身体运动所构建的生活态度让社区体育参与对于身体的改造从简单的生理学身体延续到了社会性身体,进而扩展到生活全领域,这是超越简单生理身体改造的具身性体验。对于一些非病患群体而言,其参与社区体育锻炼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朝着更加理想的方向发展,充满活力的体态等能够极大提升个体的身体自信,从而在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中更加肯定自己的身体,也能够通过身体的展现来获得他人的认可和肯定,这就是社区体育对于身体活动的改造。

4 居民社区体育参与中“情感”的具身体验:角色情感与群体情感的认同强化

4.1 志同道合与自我价值追寻:角色情感的强化体验

4.1.1 志同道合与志趣相投:体育爱好者群体的情感共鸣

运动兴趣是驱使个体长期进行体育运动参与的持久内在动力,决定着个体是否能够养成体育参与的良好习惯。但是这种持久性的运动参与兴趣并非仅仅来源于外在的刺激和感受,主要是源自内心的驱动力^[16]。社区体育主要是以一种集体参与的形式展开,在现代商业性社区普遍缺乏血缘、业缘关系的支撑下,社区居民如何能够持久性的参与到社区体育中,运动兴趣会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在所走访的6个小区中,有3个小区属于近3年才入住的新小区,相对于企业附属小区而言,这3个由开发商修建的商品房中,居民之前并没有过多的人际交往和互动,但是每个小区都有自己的广场舞队,其中一个小区还成立了社区足球队和夜跑团,3个小区在社区体育组织建设方面均具有一定成效。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相对于传统的厂矿小区而言,3个新小区的业主大多为中青年群体,因此也并不存在上文对于中老年群体分析所提出的个人价值重塑这一原因,由此,笔者将运动兴趣纳入研究视野。

体育运动虽然从形式和内容上存在个体单独习

练的条件和可能性,但是体育更多的是以一种集体行为的形式出现在习练者群体中的。在社区体育当中,只有在形成锻炼群体之后才会形成一定形式的集体活动或业余赛事,这对于体育运动参与者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全民健身的推进以及社会居民健身意识的提高,人们的健身兴趣不断得到强化,但是在一些新组建的社区中,由于业主相互之间的交流互动较少,因此存在体育参与兴趣的业主个体无法在短时间内快速寻找到存在相同体育健身兴趣的其他业主,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个体的社区体育参与积极性。

“我之前挺喜欢打篮球的,原来那个小区有两片水泥篮球场,虽然条件差点,但是一帮子人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打一会,慢慢就形成习惯了,好像不打球感觉每天就少点什么一样。但是去年买了新房子,新小区附近虽然有篮球场,但是总是感觉不太好意思,而且每天打的人也不固定,慢慢的我也就不去了。”(小J,33岁,L小区业主,访谈记录20221002)

但是对于一些修建时间较长或体育参与条件较为完善的小区而言,无论是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还是小区体育参与平台的搭建,一些具有相同体育参与兴趣的居民能够快速且稳定地聚集在一起,并逐渐将体育参与内化为一种行为习惯,强化社区体育参与的内部动力,同时也能够形成一种外部制度,通过群体之间的口头协议来约束自身的体育参与行为。

“我的体育锻炼项目就是夜跑,之前也参加了小区的夜跑团,新来了这个小区还担心没有一起参与夜跑的“伙伴”,结果来了之后发现小区年轻的跑步爱好者很多,我们相互加了微信,也成立了微信群,每天结伴夜跑,既有乐趣,又能够相互监督。”(小L,26岁,M小区业主,访谈记录20220911)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群体目标是否能够高度一致很大程度上受到群体成员需求满足程度的高低,群体成员一旦在体育参与兴趣上达成一致,相互之间的兴趣驱动力会提升居民参与体育的内在驱动力。这种基于兴趣基础之上的内在驱动力对群体成员个人认同的强化也会产生积极作用,从而促使其社区体育参与行为更加稳定和持久,因此兴趣也应该成为解释居民参与社区体育行为的一个重要维度。

4.1.2 “后喻文化”与老龄化社会:中老年群体的自我价值追寻

Margaret Mead(玛格丽特·米德)在分析人类社会文化传承与变迁中提出了“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的概念^[13]。Mead认为,在“前喻文化”的传统人类社会,老人是生活经验和生活技术的集大成者,社会的进步和变迁所依赖的技术革新需要通过内化于老年群体记忆中的技术和经验才能够完成,因此在传统前喻文化社会中老年人是社会进步所依赖的技术传承的核心人物,因此更多地受到了青年一代的尊重和推崇。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社会发展所依赖的关键技术更多的依赖于青年群体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来实现。代际之间的鸿沟日益明显,老年人群体向下一代能够传授的生活技术和经验不断减少,青年人开始以同辈群体作为个人成长与发展的参照标准,这也标志着传统前喻文化社会的崩塌以及后喻文化社会的到来。在后喻文化社会中,老年人所掌握的生活技术和生活经验对于现代社会所起到的作用极为有限,这就意味着老年人群体自我价值的实现遇到了更大的困难。甚至在后喻文化社会中,最新的生活技术被掌握在青年人一代手中,因此老年人想要进一步适应现代社会,就需要青年人向其传授基本的现代生活知识和技能,这进一步加强了老年人群体对自我价值的否定。由此可见,如果能够在后喻文化社会中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自我价值实现路径,已经成为老年人群体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随着全民健身工程的不断推进,社区公共体育活动已经成为中老年群体展现自我、重塑个人认同感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一些有组织、能够参与专门性赛事的社区集体体育活动中(如广场舞团队、太极拳团队、门球队等),中老年群体能够在这些活动中通过展现个人体育运动水平来获得集体性的荣誉,这对于中老年群体重塑个人价值至关重要。

“去年从单位退休,儿子和儿媳妇在北京,人家顾着保姆看孩子,也不用我管。今年参加了小区的门球队,自己水平还凑合,咱也代表小区打比赛了,也不是啥用也没有。而且儿子知道我天天打门球,还夸我年轻有活力!”(M先生,61岁,L小区业主)

在社区体育参与中,中老年群体通过不断提升

自己的体育参与水平能够为社区或者集体带来不同的荣誉,这种荣誉让中老年群体在工作能力弱化的情况下重新实现对自己的认可,建立一种新的自我认同。在对多位参与社区体育活动的老年人进行访谈中发现,积极参加社区体育活动的老年人群体在心理年龄上有着明显的年轻化趋势,而且通过参与社区体育活动,老年人进一步得到了青年一代的肯定和赞许,实现了良好的代际沟通。与此同时,在社区体育参与中,老年人群体会不断获得年轻人的赞赏,这让老年人在脱离工作岗位之后能够重拾久违的个人成就感,并且能够提升自己的自我满足感和自豪感,对于中老年个体自我认同的构建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此可见,中老年群体一旦能够在社区体育互动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认同,强化内心活动中的满足感和愉悦感,对于社区体育活动参与的积极性也会进一步强化。

4.1.3 运动刺激的感官追求: 身体感觉的多重控制

虽然居民在一些难度要求相对较低的社区体育项目中更容易实现初级控制,但是大多数青年群体甚至是一部分中老年群体则更容易参与到高强度的体育活动或体育比赛之中,这是由于其能够为参与者带来更多的运动刺激和运动快感,这是一些低强度或者单独性体育锻炼所无法实现的。

“我身体很好,我参加体育锻炼就是为了刺激,我每周都要参与3次以上的篮球比赛,没有比赛就和其他业主一对一地比拼,大汗淋漓之后的运动快感是其他活动没有的,而且真刀真枪的比拼也让我的情绪得到了发泄!”(G先生,29岁,访谈记录20221014)

年轻人追求运动刺激是其不愿意进行初级控制的原因,对于青年人而言,忍受运动中身体的不适本身就是运动的乐趣,对于中老年而言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

“近几年我身体确实大不如从前了,但是从年轻那会我就是厂篮球队的主力,现在我还是喜欢打篮球,他们让我去跳广场舞,我觉得不过瘾,还是和年轻人一块打球比赛过瘾,这才是体育,我只要能动,就一直坚持下去!”(F先生,65岁,访谈记录20221017)

由此可见,部分居民对于社区体育的强度是有着特殊要求的,却很少有居民在社区体育参与中发

生运动损伤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居民对于体育运动刺激感觉的追求和身体条件之间实现了一种平衡。可以看出,社区居民在体育锻炼项目的选择方面不仅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运动刺激需求,同时也减轻了身体的不适感。首先,这种运动项目和形式上的选择有效的减轻了居民对于自身身体风险的担忧,在一种更加安全的环境下满足了自我体育参与需求;其次,在充分了解身体条件的情况下,居民也会遵从自己的运动意愿去选择喜欢的社区体育参与内容和参与形式,从而产生了良好的运动体验;最后,居民在长期的选择环境下逐渐能够形成相对固定的运动群体,彼此之间对其他参与者的身体条件也慢慢会产生更为准确的认知,大家相互之间对于身体风险的担忧会不断降低,群体参与的乐趣和相互之间的信任感也会随之而提升。

4.2 群体荣誉与社会性回报: 群体情感的改造意愿

社区体育作为一种公共活动,参与者更加注重的是基于尊重、价值肯定和能力评价之上的“角色认可”,是一种区别于经济收益的社会报酬,这种社会报酬的价值在于能够让参与者将自身的社会期望与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相统一,被看作是一种“积极群体”。目前,西方学者对于“积极群体”的研究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但是研究的范畴主要限制在了政治领域,国内学者自20世纪之后也在社区公共事务研究中开始对这种“积极的少数人”进行了关注^[14]。在社区体育中,一些主要的参与者期望能够通过自身对于社会体育的参与和带动,在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基础上获得更多的社会报酬,并通过这种社会报酬逐渐完善自身群体角色和社会角色的建构。从这一层面来讲,社区体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通过体育活动获得相应的社会报酬,然后逐渐形成在群体或社会中的角色认同,因此社区体育对于其中的积极参与者而言也是一种建构和强化角色认同的有效路径,促使其形成了社区体育活动参与的行动逻辑。

4.2.1 “面子”回报: 他人肯定与赞许下的角色认同

面子是中国社会关系所孕育出的一种独特的心理机制,面子是透视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关键,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在社会交往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心理状态、行为选择与行为方式^[15]。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面子”之所以能够对自身的心理和行

为产生重要影响,实质上是将“面子”看作是借助外界评价来判断自身价值的重要工具。在公共活动之中,面子是参与者所期望的重要社会报酬,也是个体在群体活动或社区活动中构建角色认同的重要手段。

与传统西方道德相比,中国的伦理道德是基于一种家族宗法和传统群体观念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因此中国人对于自身的社会评价更需要借助外在评价来完成,他人对自身行为的认可能够有效构建和强化人的角色认同。在一些带有组织或群体性的活动中,许多群体和组织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更加看重是否获得了其他群体成员的认可,并通过这种认可实现了一种社会报酬的获得。从符号互动理论来看,面子在中国人的群体交往中是一种体现与他人之间良好关系的符号象征,这种符号象征也是维护个体与他人之间良好群体关系同时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重要动机。简单而言,“面子”能够让个体在社区体育参与中获得满足感和愉悦感。

“现在国家政策好了,老百姓锻炼的积极性也高了,政府也组织我们这些人参加了许多比赛。社区每年都有广场舞比赛,下个月的消夏晚会街道让我们作为代表去参加表演,队里的人都认可我,为了准备比赛每天训练。街道的领导还夸我工作能力强,其实都是大家认可我,相互之间鼓励也有干劲儿!”(K女士,51岁,20220722)

诸多学者在政治学中所提出的“积极的少数人”同样在社区体育中也有所存在,这种社区体育参与与积极分子的角色认同是在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他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不断获得他人有效评判来完成的。社区体育活动的积极分子在体育参与过程中一旦获得他人较高的认可或赞许,其主动参与社区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也会进一步得到提升。虽然在“理性人假设”中,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是驱使个体产生行为的逻辑前提,但是在社区体育积极参与者中,这些关乎自身评价的“面子”已经深深烙印在了个体的行动逻辑之中,社区体育参与者通过获取面子来实现自我角色的构建,“面子”作为一种社会报酬成功的实现了社区体育参与者对自身角色的有效认同,相对于物质回报而言,这种角色的自我认同能够保证个体在社区体育活动中保持更加积极和持久的主动性。

4.2.2 “荣誉感”获得:群体激励下的角色认同

在现代社区内部,市场资源的多元化流动使得市场和群体关系的作用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传统模式下完全依赖于行政组织权威约束集体动员的效力有所下降。因此在更多的社区中,个体之所以能够积极参与到社区公共体育活动中,并不是由社区或上级政府强制干预实现的,而是由非正式的、依靠人情关系所形成的区域性群体或组织来实现的。由此,社区公共生活的参与并不是完全游离于政府的行政权力之外,而是逐渐走向了政府倡导的自主治理导向,将政府干预与社区人情交际相结合形成的新型社区活动制动性动员模式更能够适应目前社区发展和变迁的基本现状。

在这种新型的制动性动员模式中,政府与社区内人情交际形成了一种理想的配合效果,在这种模式中,政府逐渐改变了之前行政干预,转而通过一种制度性的激励手段来鼓励居民参与到社区体育活动中,政府在社区公共体育活动中的激励手段主要是荣誉称号。奥尔森在分析集体行动逻辑时指出:“尽管优秀党员、优秀志愿者等行政体系颁发的荣誉称号很少附带物质奖励,但是它们能给获奖者带来社会性激励。”^[16]这是因为政府颁布的荣誉称号更能够对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进行权威性的认可。在社区体育活动的参与中,这些出自政府的权威性荣誉会不断地鼓励个体将积极的自我标定内在化,进而实现有助于社区体育参与的角色认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权威性荣誉就成为居民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的关键驱动力。

在走访的一些社区内,政府在通过权威性荣誉督促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方面是具有成效的。L小区在筹备广场舞展演时会时常接收到街道居委会甚至区级政府部门领导的探望,H厂小区所在的居委会会定期根据社区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颁发“社区体育先进个人”“社区体育突出贡献奖”等荣誉称号和奖项。在这一过程中,所在小区的社区体育参与者会在此类荣誉称号的作用下产生极为强烈的荣誉意识,尤其是在传统的单位制环境成长下的中老年群体,这种荣誉意识会被更为直接和快速的唤醒,从而更为积极主动的承担社区体育活动的组织参与工作。由此可见,由政府部门赋予的权威性荣誉能够促使社区体育参与者通过构建角色认同来影响其

参与行为。

社区体育活动的权威性荣誉不仅来自政府所颁发的各类荣誉称号,同样还来自上级政府部门领导的肯定,包括口头表扬或物质扶持等。如在笔者所调查的X社区虽然属于新建社区,但是社区内仅仅太极拳团队就是3支,广场舞队有2支,这一方面取决于社区内居民的体育参与意识,但是同样受到上级部分领导的影响。

“书记很给力,经常来看我们表演,有几次还在下班之后和我们一起扭秧歌,凡是反映的问题,书记能解决的都给我们解决了。领导重视我们,我们自然也不能辜负领导的关心,不管上面支持多少,我们自己肯定办好自己的队伍。”(X社区广场舞表演队负责人L先生,66岁,访谈记录20220923)

从权威性荣誉来看,带给社区体育积极分子的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性报酬。对于传统家族观念影响和科层制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老百姓,政府和领导的认可对于个人的驱动力并不会低于物质性奖励,其对于自身行为逻辑的产生也会有着重要影响。居民在社区体育的参与过程中不断的构建和完善着自我角色认同,上局部门的认可使其在这种角色认同中有着更多的投入,这就会进一步鼓励居民在这一角色下持久性地发生相应行为^[17]。

5 居民社区体育参与中“空间”的具身体验:群体的空间性聚集

5.1 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优化:物质空间的有效拓展

场地设施是个体从事体育锻炼的基本物质前提,同时也是影响居民体育参与关键性要素。从社区角度而言,为居民提供优质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就是能够配置完善的社区体育场地设施。从目前来看,居民社区配套建设体育场地设施得到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体育总局、自然资源部等中央部门的重视,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优化不仅能够提升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质量,同时也能够扩大居民的体育参与空间,这就为居民社区体育参与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

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优化让居民有了更多的体育参与选择,参与空间有了质的提升,直接满足了居民的社区体育参与需求。在笔者走访的几个社区

中,近几年都实现了体育场地设施的优化,修建的篮球场、室内棋牌室、健身空地、健身步道等场地设施,满足了居民社区体育参与的多元化需求,让居民体育参与的空间实现了拓展,居民体育参与的场地面积、场地种类、场地环境有了明显优化,参与质量有了更好的保障。

“我喜欢打篮球,但是之前小区的空地都是停车位,每次打球都需要去附近的商业场馆,交通不便,费用也高。但是现在小区规划了车位之后,修建了一片篮球场地,现在下楼就能打球,而且社区也有固定的篮球群体,完全不用出小区就能进行体育锻炼。”(K先生,31岁,访谈记录20220909)

体育运动的专业性要求居民在从事体育锻炼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基本的场地设施保障,同时作为一种休闲健康活动,也需要再体育参与过程中获得良好的身体体验和情感体验,这就意味着社区体育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物质环境。在体育场地设施条件的保障下,居民的社区体育参与在参与项目、参与时间、参与人数等多个方面实现了强化,社区体育参与空间得到了拓展。

5.2 社区体育参与群体的形成:群体的空间性聚集

在社区体育参与中,群体性参与应该是最为常见的形式,一方面多人参与能够丰富体育锻炼的内容,强化参与的体验感,另一方面则是可以通过群体性的参与来构建一种组织认同,通过这种组织认同来促进自己更好的参与社区体育活动,如彼此之间的相互监督等。社区体育参与过程中逐渐形成群体,这是空间所具有的吸引力优势,虽然社区体育在参与要求和规范性上相对较为简单,但是大多数人仍然认为群体性的社区体育参与对于自己更加具有诱惑力。

“我之前也一个人锻炼,但是主要是在健身房,现在新的小区有灯光球场,我就不怎么去健身房了,还是和小区里的其他业主一块打球更刺激,能出汗,而且相互之间的比赛也更有意思,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爱好者群体一天比一天稳定,大家关系一天比一天好,这是在健身房做不到的。”(R先生,32岁,访谈记录20221023)

群体性的社区体育参与给居民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锻炼体验,同时也有群体社会交往方面的体验,居民在社区体育这一空间中聚集,社区体育作

为一种特殊的场域成为居民进行社会人际交往的特殊空间,同时也强化了空间的居民“主导”特性。在原有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居民的社区体育行为遭到了极大的偏见,如“广场舞扰民”“锻炼群体冲突”等,但是在社区公共空间不断扩大,社区体育不断得到重视的背景下,社区居民在获取体育参与空间方面更加便捷。

“原来小区的公共空地没有人管,基本上就是用来停车的,我们跳舞占了人家的车位发生了好多冲突,跳广场舞和“打游击”一样,今天一个地方,明天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小区有了规划,专门拿出来一片地用作体育锻炼,我们现在有了固定的场地,锻炼质量也更高了!”(M小区广场舞队负责人Y女士,66岁,访谈记录20220922)

其实从空间的角度而言,一方面,社区体育需要

实体性的“空间”,即要有用于社区居民参与体育运动的场地和设施,这是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基础性条件。随着全民健身工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社区的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有了明显改善,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硬件设施的配套和升级,健身设施、健身场地、健身路径的配置让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有了实体性的空间,获得了最为基本的条件。另一方面,居民社区体育参与也需要一种群体性空间,虽然单独从事社区体育并不意味着锻炼质量的下降,但是参与一些集体性的社区体育活动或者比赛的确能够强化居民自身的体验感。同其他社会性的体育场所或者正式的体育比赛相比,居民在社区内从事体育锻炼更具归属感,能够与相互之间较为熟识的其他居民在锻炼之中交流和互动,表现出一种更加轻松和自由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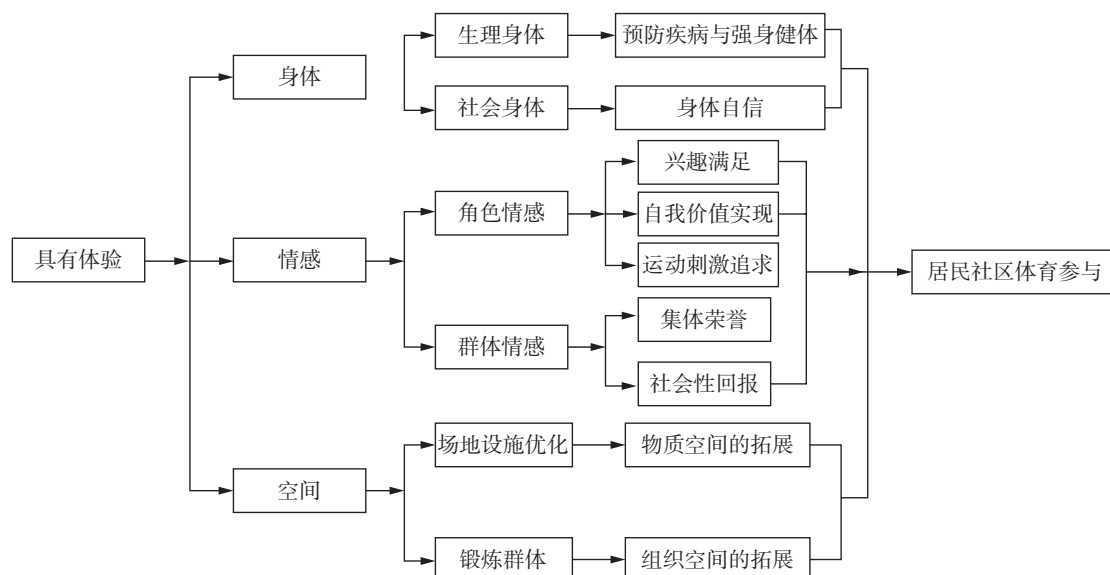


图2 实证应用图谱

Fig.2 Empirical application map

6 结语

基于6个城市社区的实证研究来看,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具身体验是多维度的,身体、情感与空间等3个层面的体验感共同构建了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机制,这也印证了之前所提出的研究假设,即居民参与社区体育并非仅仅出于“身体健康”的考虑,情感体验和空间再造同样是促进居民社区体育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首先,从身体角度而言,居民在社区体育参与中不仅仅希望提升自己的生理健康水平,同时也希望能够改善自己的社会身体,提升他人对

自我身体的认可度和欣赏度;其次,从情感层面来看,个人情感与组织情感的具身体验影响了居民社区体育的参与,个人在社区体育参与中的价值回报与他人认可让参与行为有了内在驱动力,组织认同感的提升也让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有了重要他者的陪伴,让参与行为有了群体认同的驱使;最后,从空间层面而言,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改善让实体性空间条件得到了强化,居民社区体育参与有了良好的物质保障,同时参与集体性的社区体育活动也让组织空间得到了扩大,社区居民不再有个体空间的“孤

独感”,这也促进了居民的社区体育参与行为。

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是一种自主性行为,这种自主性行为受到了主客观多方因素的影响,但是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社区体育参与的“体验感”,具身体验让居民在社区体育参与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进而诱发并不断强化着社区体育参与行为。因此在促进居民社区体育参与的过程中,社区体育治理的各个主体方要认识到居民在社区体育参与中的多维度具身体验,从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角度来提升居民社区体育参与的实际效果:第一,从身体维度出发,社区体育组织的主体方要针对居民的健康需求提供相应的社区体育服务,同时也要引导、帮助居民了解健身知识,掌握健身技能,让居民真正能够通过有效的社区体育参与改造和优化自己的身体;第二,从情感维度出发,社区要让居民在社区体育参与中感受到多方认可,同时也需要搭建多方参与平台,让居民能够参与的不同的组织和群体中,培养组织情感和群体认同;第三,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在不断优化社区体育场地设施条件的同时,要为广大居民创造更大的组织空间,无论是街道、社区还是体育社会组织,要引导和帮扶居民形成相应的参与群体,从更大的组织空间来带动居民的社区体育参与。总而言之,无论是在后续的学术研究还是社区体育治理实践中,居民社区体育参与的多维度“体验感”应该被更多的加以关注和重视,从居民本身出发来解决问题才是提升社区体育参与质量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 [1] 杨学智,刘宗杰,张园春.社会公共体育服务评价体系构建及测评效率提升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9,28(2): 22-27.
- [2] 易锋,陈康.我国苏南地区社区居民体育参与困境及对策[J].体育文化导刊,2018(8): 59-63.
- [3] 程丽婷,董传升.我国社区居民体育健康行为的生态化治

- 理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3,42(3): 69-76.
- [4] 冯侯睿,郑家鲲.数字技术助推社区体育精细化治理:内涵、机制和路径[J].体育学研究,2023,37(2): 85-95.
- [5] 郑贺.后疫情时代社区体育路径选择[J].体育文化导刊,2021(1): 47-53.
- [6] 梁勤超,王洪坤,李源.冲突与治理:城市社区公民体育权益冲突的社会学审视[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9,34(4): 286-289,314.
- [7] 陈广勇,杜艳伟.超大型新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的实证研究——以成都市龙华社区为例[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39(5): 52-57.
- [8] 张贤明,高光辉.民生的政治属性、价值意蕴与政府责任[J].理论探讨,2011(6): 25-29.
- [9] 单菁菁.从社区归属感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6): 125-131.
- [10] 李晓栋,颜秀真,刘紫薇.嵌入式治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模式研究——基于S省T市两个社会组织的实证分析[J].体育学研究,2021,35(2): 83-91.
- [11] BURY M. Chronic Illness as Biographical Disruption[J].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1982, 4(2): 169.
- [12] 傅健.运动兴趣的研究取向[J].体育与科学,2016, 36(5): 97-100.
- [13] 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的研究[M].周怡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 [14] 桂勇.邻里政治:城市基层的权力操作策略与国家-社会的粘连模式[G].上海市社会学学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2006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06.
- [15] 赵云亭,濮敏雅.脱嵌与融合:面子心态的流变、影响与出路[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20(4): 49-54.
- [16] 奥尔森·曼瑟尔.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17] STRYKER S.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 Social Structural Versio[M]. Palo Alto: Benjamin /Cummings, 1987.
- [18] 曹钰舒,贺雯.毕生发展动机理论述评[J].心理研究,2012, 5(5): 3-8.
- [19] 陈海飞,熊欢.运动、“身体感”与文化:一项女性健身感官民族志研究[J].体育与科学,2023,44(3): 34-41.
- [20] 张文义.具身理论的空间模型与日常生活中的人类学实践[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8(5): 96-106.
- [21] 马元龙.身体空间与生活空间——梅洛-庞蒂论身体与空间[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33(1): 141-152.

Physical, Emotional and Spatial Reconstruction: the Embodied Experience of Urban Residents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Sports

——Fieldwork based on 6 Urban Communities

LI Xiaodong^{1,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Taiyuan 030051, China; 2.College of Sports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0,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mbodied experience of urban residents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sports from physical, emotion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aim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sports from a diversified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the physical, emotional and social experiences together construct the mechanism of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sports. From the physical point of view, residents not only hope to improve their physical health through effective sports participation, but also hope to improve their social health. From the emotional perspective, the value return and the recognition of others in community sports participation provide an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Meanwhile, the improvement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companionship for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sports, driving participation behavior with group ident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pursuit of sports stimulation also satisfies the participants' personal emotional needs. From the spatial level, the improvement of community sports facilities has strengthened the physical space conditions, and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community sports activities has also expanded the organizational space.

Key words: physical health, emotional experience, space reconstruction, embodied experience; urban residents, community sports

(上接第 87 页)

Folk Sports Culture and Primary-level Party Building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Dragon Boat in Y Village

NI Jun, YANG Shumei, TU Chuanfei, WU Lifa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folk sports culture and primary-level Party building not only helps to explore the path of inheritance,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Party building. Using case studie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ion of dragon boat culture and primary-level Party building in Y Village.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follows the progressive mechanism of identification, absorption, and production: through func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symbolic identification, the cultural boundaries of the two are dissolved; the absorption of resources promotes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he two, presenting a posture of a unified whole; in the production of governance legitimacy and inheritance reliability, the integration posture is effectively maintained for a long term. The mutual integration of folk sports culture and Party building is a modernized development path in China, which helps to establish a mechanism for closely contacting the masses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primary-level Party building, and the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can make use of the stock of folk sports resources to realize the simplified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side.

Key words: folk sports culture; primary-level Party building; mutual integration practice mechanism; rural governa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